

從開創帝業到三宮協和： 元仁宗朝前答己太后的政治活動*

許 正 弘**

摘 要

答己是世祖皇太子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元妃，在答剌麻八剌死後，守寡育子十五年。大德末年，她偕同少子愛育黎拔力八達進入大都，發動政變，並順利取得政權。此後，答己稱皇太后凡十三年、稱太皇太后三年，總共長達十五年。她對朝政的影響既深且久，在元朝政壇上幾乎無人能出其右，值得深究。本文深入考察答己在仁宗朝前的政治活動，重新檢討她在大德末年皇位爭奪戰中「開創帝業」的歷程，析論她在武宗朝與皇帝及皇太子共構所謂「三宮協和」的政治新局，從中闡釋其權力基礎的形成與政治影響力的擴大，期能增進對於元中期政治史的理解。

關鍵詞：答己、元武宗、元仁宗、大德末年政爭、徽政院

* 本文主要依據個人博士論文〈元朝的太后、官署與政治〉（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8）第二章刪削補正而成。改寫、投稿及修訂期間，承蒙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110-2410-H-031-003-MY3）補助，謹此致謝。今次投稿，有幸獲得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高見，幫助強化拙作的論證，減少不必要的錯誤，至為感謝。唯文中有任何問題，仍由筆者自負。

**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A Study on the Political Activities of the Empress Dowager Taki before the Reign of Renzong of Yuan

Hsu, Zheng-hong*

Abstract

Taki was the first concubine of Darmabala, who was the second son of Jingim, and the crown prince of emperor Shizu. After Darmabala's death, Taki was widowed and brought up her sons for fifteen years. In the late years of Dade, she entered the capital with her young son Ayurbarwada, launched a coup, and successfully controlled the power. After that, she became Dowager Empress for thirteen years, Grand Dowager Empress for another three years, a total of fifteen years. She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unsurpassed by anyone on the government of the Yuan Dynasty, which deserves a close stud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aki's political activities before the reign of Renzong of Yuan, re-examining her role in the struggle for 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the last years of Dade,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new political situation in which she, the emperor and the crown prince worked together for the alleged "harmony of three palaces" in the reign of Wuzong. It will therewith explain how her power base was formed and her influence extended, which would th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mid-Yuan.

Keywords: Taki, emperor Wuzong of Yuan, emperor Renzong of Yuan, political struggle in the last years of Dade, Huicheng yuan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Soochow University

壹、前言

答己（*Taki, ?-1322），¹一譯答吉或姐吉，弘吉刺氏（Qonggirad），世祖皇太子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Darmabala, 1264-1292）元妃。答剌麻八剌死（1292）後，答己守寡育子十五年。大德末年，成宗（Temür, 1265-1307, 1294 即位）崩逝（1307），她偕少子愛育黎拔力八達（Ayurbarwada, 1285-1320）進入大都（治今北京），發動政變，並順利取得政權。她一度屬意由少子繼位，試圖勸退其長子海山（Qaišan, 1281-1311），卻因後者的強烈反彈而未能如願。母子三人最終達成協議，由長子先當皇帝，是為武宗（Qaišan, 1281-1311, 1307 即位），答己被尊為皇太后，少子則受封為皇太子，準備兄終弟及。在武宗一朝，皇太后懿旨、皇太子令旨與皇帝聖旨時常一同頒行，效力幾乎相埒，呈現鼎足以立的態勢。而答己從1307年起稱皇太后凡十三年、太皇太后三年，總共長達十五年。她對朝政的影響既深且久，在元朝政壇上幾乎無人能出其右，²值得深究。

中國歷代王朝中期往往邁向鼎盛，而元代中期卻是政爭迭見，二十五年間（1307-1332）換了八位皇帝，紛亂異常。這是元代一個不算光彩的「特色」。³ 除此之外，當時史料存見至今者亦復顯得貧乏，於是元中期政治過往較少受到學者關注，向為元史研究較稱薄弱的一環，良有以也。⁴ 其中，關於武宗及其統治的論述，學界往昔多採《元史》觀點，而以負面評價為主，⁵相關論著尤其有限。不過，至今已有若干觀點新穎的論作，深化並修正了對於武宗朝的成見。武宗過往飽受批評的泛濫封賞政策，換個角度來說，其實是為因應元代社會自成宗大德後期以來漸趨惡化的政治和經濟問題，更是為了穩固自己一系的政治基礎，確保

¹ 答己名字對音的構擬，見邱軼皓，〈蒙古帝國的權力結構（13-14 世紀）——漢文、波斯文史料之對讀與研究〉（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學位論文，2011），頁 190。

² 這是陳高華概括答己政治地位的評語，實屬洞見。見陳高華，〈中國婦女通史·元代卷〉（杭州：杭州出版社，2011），頁 40。本文即係受其啟發而進一步開展的論證。

³ 陶晉生，〈宋遼金元史新編〉（新北：稻鄉出版社，2003），頁 201。

⁴ 蕭啟慶，〈千山獨行：我的習史歷程〉，氏著，〈內北國而外中國：蒙元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10。

⁵ 劉曉，〈「南坡之變」芻議——從「武仁授受」談起〉，中國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 12 輯（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10），頁 49-50。

「武仁授受」之後，可以順利地叔侄相承。⁶ 這提醒我們有必要不帶成見，「應該把歷史人物包括皇帝在內放到歷史的特定條件中去考察」，⁷方能重新審視武宗朝政治。而在武宗朝政治佔有一席之地之答己，則是有待論探的關鍵人物之一。

目前學界對於答己太后與元代政局的研究，已有若干論著值得參考，特別是陳高華、薛磊等先生有關專著俱見精到的論述。⁸ 但是，全面而系統的專題論文並不多見，⁹尚有許多需要深探的問題。有鑒於此，此前筆者曾發表〈元答己太后政治集團與仁英二朝政局〉一文，藉由考述答己太后位下官署——徽政院諸院使的身分，揭示其政治集團在仁、英二朝的權力本質及其運作。¹⁰ 限於篇幅與題旨，筆者尚未能考論答己在武宗朝及其前——進入仁宗朝（1311-1320）前——的政治活動。是即本文所由作。本文論證的重點有二：一是重新檢討答己在大德末年皇位爭奪戰中開創帝業的歷程，二是詳加考察她在武宗時期與皇帝及皇太子共構所謂「三宮協和」的政治新局，從中闡釋其權力基礎的形成與政治影響力的擴大，以期增進吾人對於元中期政治史的理解。

貳、開創帝業：從宗王妃到皇太后

答己畫像，係屬元代帝后肖像畫之一，今藏臺灣故宮博物院。畫作藉由反覆而細膩的暈擦手法表現立體，刻意降低線條的運用，展現中國傳統之外的新風格。仔細端詳畫中的答己，面容略顯豐腴，雙目較為圓大，都與其他皇后像有

⁶ 劉曉，〈「南坡之變」芻議〉，頁50-52。

⁷ 黃永年，〈說永徽六年廢立皇后事真相〉，《陝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1981），頁81。

⁸ 薛磊，《元代宮廷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頁177-181、195-199；陳高華，《中國婦女通史·元代卷》，頁37-40。George Q. Zhao and Richard W.L. Guisso合著的“Female Anxiety and Female Power”一文，重新梳理蒙元時期后妃干政，亦有可供參考者。見George Q. Zhao and Richard W.L. Guisso, “Female Anxiety and Female Power: Political Interventions by Mongol Empresses during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in China,” in Michael Gervers, Uradyn E. Bulag, and Gillian Long eds., *History and Society in Central and Inner Asia*, No. 7 (Toronto: Asian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05), pp. 17-46. 其餘通論元代史或元代政治史的著作，多少有所涉及，茲不贅列。此外，答己對漢文化的接觸及其意義，見許正弘，〈元答己太后與漢文化〉，《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53期（2011），頁89-108。

⁹ 至今似僅見一文，即：郭德靜，〈論答己在元代政治鬥爭中所起的作用〉，《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5卷增刊（2003），頁202-204。唯其文簡略而多訛誤，參考價值恐怕有限。

¹⁰ 許正弘，〈元答己太后政治集團與仁英二朝政局〉，《臺大歷史學報》，第66期（2020），頁1-44。

別。¹¹ 這是藉以想見其人的珍貴文物。而答己《元史》本傳計千餘字，即便不足盡表其人，篇幅卻已居諸后妃傳之最，則是後人研索其跌宕多姿政治生涯的重要依憑。

披讀答己《元史》本傳，不難看出傳文係按其生平依序擇要記述，但她的早年事跡，猶如元代其他后妃，絕少見載，無從詳考。有關答己的本家及其出身，目前僅知她出自同元室世代通婚的弘吉剌部特薛禪（Dei Sečen，生卒年不詳）一族，是按陳（Alčın，生卒年不詳）孫渾都帖木兒（Köndü-temür，生卒年不詳）之女。渾都帖木兒疑是按陳諸孫，屬於支系，可能並未尚主，亦無事功，生平已難索考。¹²《草木子》有答己為「一屠人婦」之說，縱難盡信，至少代表當時對其出身寒微的傳聞。¹³

答己夫婿答剌麻八剌（後人追上廟號順宗），是世祖（Qubilai, 1260-1294, 1260即位）之孫，真金（Jingim, 1243-1286）與元妃闊闊真（Kökejin, ? -1300）之次

¹¹ 王耀庭，〈蒙元王朝帝后圖像〉，《故宮文物月刊》，第 226 期（2005），頁 58-71；陳韻如，〈蒙元皇室的書畫藝術風尚與收藏〉，石守謙、葛婉章主編，《大汗的世紀：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頁 267。按宋代皇后像往往藉助畫中特殊的冠服、妝飾或手勢，甚至是坐具，彰顯個人政治地位。Hui-shu Lee, *Empresses, Art and Agency in Song Dynasty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0), pp. 23-69. 唯答己像有無傳達政治意涵的畫外之意，目前似難輕下論斷，請俟方家解讀。

¹² 張岱玉輯考弘吉剌部首領事跡，只能依據《元史》的〈特薛禪傳〉與〈后妃傳〉簡述渾都帖木兒其人，無法增添新材料。見張岱玉，〈元代漠南弘吉剌部首領事跡考論之二〉，中國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 12 輯（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10），頁 125。此外，據《元史氏族表》，稱渾都帖木兒為唆兒火都（按陳子）之子。見王德毅等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頁 2443。這可能有所誤讀。按《元史氏族表》僅記渾都帖木兒等三人為「安（按）陳孫」，而唆兒火都只有阿哈一子。見（清）錢大昕，《元史氏族表》（收入《二十五史補編》，上海：開明書店，1937，據《潛研堂集》本排印），卷 1，頁 14。

¹³ （明）葉子奇，《草木子》（北京：中華書局，1959，點校本），卷 4 下，〈雜俎篇〉，頁 84。「一屠人婦」云云，「婦」字難以理解。妻乎？媳乎？女性通稱乎？都有可能。韓志遠利用這條材料，認為「雖係不可靠的傳說，但是也可以作為元代蒙古人並不太看重貞節的一種反映。」進而主張婦女於夫死或離婚後再嫁，對於當時蒙古族來說，無可非議。見韓志遠，〈元代婚姻制度述論〉，北京師範大學古籍所編，《元代文化研究》，第 1 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 285。關於答己的出身，《史集》有兩處頗為費解的記述。一在記侍從與臣屬忽必烈合罕（元世祖）的宗王及大臣時，提到：「海山 Khai-Shang 係答亦乞 Taiki 之子，為一宗王。答亦乞為阿速台 Asutai 諸妻之一，極美，合罕取以為妻。」另一在記鐵穆耳合罕（元成宗）處置降附宗王時，云：「阿速台之妻答亦乞 Taiki 及其子海山 Khaishang 素得合罕之寵幸」。見（波斯）刺失德丁特原著，波義耳英譯，周良霄譯注，《成吉思汗的繼承者》（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頁 348-349、408。所見「答亦乞」應即「答己」之異譯，倘與本文討論的答己太后為一人，則她從蒙哥汗次子阿速台妃（忽必烈侄媳）而遭忽必烈汗強娶，後再嫁作答剌麻八剌妻（忽必烈孫媳），身分變換之大，簡直不可思議。有學者抱持肯定的態度而作種種推測，見宮紀子，〈『元典章』が語るフレグ・ウルスの重大事変〉，《東方學報》，第 91 冊（2016），頁 384-385。唯其說仍未足以駁倒目前可見的諸多證據，令人不得不持保留的態度。

子。他的生平事跡不詳，《元史》有傳，卻是簡略而有疑。至元二十八年（1291），他年已二十八歲，世祖與闊闊真妃「優其出閣之禮」，¹⁴有命出鎮懷孟（後改名懷慶，又稱懷州、覃懷，治今河南沁陽），未至而因疾召還。明年春，他無法隨從世祖北幸，必須留在京師治病。兩個月後（五月）病故，得年不過二十九歲。¹⁵ 懷孟是世祖忽必烈（Qubilai, 1215-1294）於憲宗六年（1256）受封的湯沐邑，隔年獲撥 11273 戶，佔全路總戶數（34993 戶）近三分之一。¹⁶ 答刺麻八剌以之作為封地，可謂優厚，但受重視的程度，遠遠不及年歲與他相近的兩位同母兄弟——甘麻剌（Kammala, 1263-1302）和鐵穆耳（Temür, 1265-1307）。¹⁷ 畢竟他們二人早在此前數年，就曾先後奉命領兵征戰漠北，肩負重任。答刺麻八剌長侍乃父身旁，世祖於其稍長就賜以女侍，而其出閣所就封國，時間既晚且非關要。凡此種種，他天生瘖疾而體弱多病，可能才是主要的原因。¹⁸

答己與答刺麻八剌成婚時間，史無明文，無法確考。唯一可供推算的根據，是長子海山出生年月（至元十八年（1281）七月）。以十月懷胎計，雙方最晚應在至元十七年（1280）九月前成為夫婦。倘以至元十七年（1280）為準，答刺麻八剌年方十七，答己年歲或亦相仿。¹⁹ 而答刺麻八剌於至元二十八年（1291）出鎮時，他在真金三位嫡子之中，較具政治優勢的是他乃三兄弟之中唯一擁有兩位以

¹⁴ 《太常集禮·順宗昭聖衍孝皇帝諡議》同樣強調：「裕皇軫惠，隆福慈祐。優于出閣之禮，重其食采之地。」茲據馬曉林輯佚文。見馬曉林，〈元代國家祭祀研究〉（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12），頁 767。唯標點略有更易。

¹⁵ （明）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點校本），卷 115，〈順宗傳〉，頁 2895；洪金富，〈元《析津志·原廟·行香》篇疏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9 本第 1 分（2008），頁 14-15。有關答刺麻八剌的死因，波斯文文獻《瓦薩甫史》說是「被謀殺」。或謂元代史籍沒有明言答刺麻八剌之死，《元史·世祖紀》甚至不載其事，而《瓦薩甫史》是獨有的記載。見邱軼皓，〈蒙古帝國的權力結構〉，頁 182、190。事實上，這個說法不甚正確，至少忽略《元史·順宗傳》治疾京師而亡的記載。《元史》病故說明顯比《瓦薩甫史》謀殺說來得可靠，畢竟答刺麻八剌倘遭謀殺，他長居元代帝位的子孫們未見追究，實在匪夷所思。

¹⁶ 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增訂本），頁 436。

¹⁷ 答刺麻八剌三兄弟連年出生，或謂長兄甘麻剌並非出自同母，在世祖死後的選汗大會自然無法獲得支持。這個說法有誤。事實上，三兄弟年齡差距都在一歲以上，而他們為一母所生，更有諸多文獻可以為證。辨見許正弘，〈杭州飛來峰元至元二十九年造像題記疏證〉，《中華佛學研究》，第 17 期（2016），頁 73-77。

¹⁸ 許正弘，〈元答己太后與漢文化〉，頁 92-93。另，張岱玉考述答刺麻八剌庶長子阿木哥事跡，曾以「失聰父王」為文中章節標題。見張岱玉，〈元朝魏王家族史事鉤稽〉，《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3 卷第 5 期（2011），頁 5。唯答刺麻八剌是否因失聰而無法言語，文獻恐怕無法徵實。

¹⁹ 元代蒙古皇族婚齡，由於紀錄闕佚，已難精確統計。大致來說，皇帝婚齡普遍較低，奉行的可說是典型的早婚制。見王曉清，〈元代社會婚姻形態〉（武漢：武漢出版社，2005），頁 67-68。

上子嗣（忽必烈的皇曾孫）者。²⁰ 日後追上答剌麻八剌尊諡曰昭聖衍孝皇帝，其中的「昭」字，諡法意調克昌厥後。²¹ 子孫的昌榮興盛，確實成為答剌麻八剌夫婦最大的政治資本。但是，政治資本可否順利兌現為政治權力，則需要更多條件及時機的配合。

²⁰ 這裡略考成宗三兄弟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左右的子嗣情況。長子甘麻剌有三子：長梁王松山（庶長子），次二泰定帝（嫡子），次三湘寧王迭里哥兒不花。三子僅知泰定帝生年，但有至元十三年（1276）與三十年（1293）二說，而應以後說為是。庶長子松山生年不詳，但至元三十年已受詔出鎮雲南，其生當更在此前。見胡和溫都爾，〈對〈元泰定帝壽年正誤〉一文的幾點商榷〉，《內蒙古社會科學》，第5期（1989），頁75-78；張金鈺，〈元泰定帝生年及其他〉，中國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10輯（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5），頁71-74。二子答剌麻八剌亦有三子：庶長子魏王阿木哥，次二武宗海山，次三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阿木哥生年不詳，但據武宗生於至元十八年（1281），應更在其前。答剌麻八剌於至元二十九年（1292）逝世，所遺三子都得長立。成宗子嗣數目較有問題。《元史·宗室世系表》載成宗僅德壽一子，早薨，無後。波斯編年史《貴顯世系》詳列成宗四子之名，長為 Qung-taishi，顯即「皇太子」，當指德壽。見 Lian Song, Louis Hambis trans., *Le Chapitre CVII du Yuan Che: Les Généalogies Impériales Mongoles dans l'Histoire Chinoise Officielle de la Dynastie Mongole. Avec des Notes Supplémentaires par Paul Pelliot* (Leiden: Brill, 1945), p. 136. 《史集·鐵穆耳合罕紀》只提到二子，陳得芝據《高麗史》於大德元年（1297）十月與三年（1299）三月各曾派使賀生皇子，確認《史集》之說應當可信，並認為「另一子可能早夭，故元史不載。」他又推測德壽可能生於大德元年（1297），修正自己過去生於元貞元年（1295）的舊說。見陳得芝，〈耶律楚材、劉秉忠、李孟合論——蒙元時代制度轉變關頭的三位政治家〉，氏著，《蒙元史研究叢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頁655；陳得芝，〈元嶺北行省建置考（下）〉，氏著，《蒙元史研究叢稿》，頁186。事實上，在《高麗史》忠烈王二十一年（1295）（元貞元年）二月甲午條，可再檢得遣使「如元賀誕皇子」的記載。見（朝鮮）鄭麟趾等著，孫曉主編，《高麗史》（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標點校勘本），卷31，〈忠烈王世家四〉，頁992。這樣一來，成宗至少應有三子，另一子或生於成宗即位前，而未見載於《高麗史》。另據程鉅夫撰〈太原宋氏先德之碑〉載，御醫宋超於元貞元年（1295），曾經奉詔醫治相繼有疾的壽寧公主、亦里海牙公主與小太子。見（元）程鉅夫著，張文澍校點，《程鉅夫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卷8，頁89。碑文提到幾位「太子」，其前無不具書名諱，如闊闊出、俺木哥（阿木哥）、碩得不剌（即日後的英宗）等，頗疑這位小太子即高麗使臣於元貞元年（1295）入元慶賀的初生皇子，可能尚未正式命名而有是稱。要言之，成宗在即位之前可能已有一子，即位後再生三子，但都不幸夭折。此外，陳得芝疑德壽生於大德元年（1297），《高麗史》有條紀錄或許可為旁證。成宗曾在大德四年（1300）七月高麗忠烈王入元侍宴之際，用皇太子千秋節（生日）為由赦免遭到高麗王罷黜的印侯、金忻等人。過往論者認為成宗大德九年（1305）六月始立皇太子，四年七月所見皇太子千秋節的赦免理由，可說是「元朝對印侯的保護」。見舒健、張建松，〈韓國現存元史相關文獻資料的整理與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5），頁69。然而，成宗隨便編造皇太子生日的理由，恐怕無法令人信服。筆者的理解是：成宗所謂皇太子，應仍指他與卜魯罕的獨生子，亦即後來的德壽皇太子。卜魯罕於前年（大德三年）十月受冊寶而為正宮皇后，子以母貴，德壽自然取得皇太子的地位，但因年幼而未正式冊立。鄭介夫於大德七年（1303）上〈太平策〉，明言「儲嗣」是最為急務的大綱，文中二見「皇太子」云云，也是同樣的道理。見陳得芝、邱樹森、何兆吉輯點，《元代奏議集錄》，下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頁55。這位生於七月的皇太子，以高麗與元廷消息往返時程計，較有可能是上述大德元年（1297）十月高麗遣使入賀所誕的皇子。印侯作為當時賀使之一，成宗予以赦免，並非純粹袒護，理由亦足以服人。波斯文文獻《瓦薩甫史》稱德壽為「小兒子」，見邱軼皓，〈蒙古帝國的權力結構〉，頁183。可能是他乃成宗第三子的關係。總而言之，成宗鐵穆耳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時，大概不會有子，或是只有一子。

²¹ 《太常集禮·順宗昭聖衍孝皇帝諡議》，茲據馬曉林輯佚文。見馬曉林，〈元代國家祭祀研究〉，頁767。

縱觀答己一生，大德末年的皇位爭奪戰，或稱成武授受之變，無疑是她「兩開帝業」，²²躍居政治要角的轉捩點。此前十五年，她寡居大都，具體事跡可知者無幾。²³此後十五年，她從宗王妃到皇太后，進而被奉為太皇太后，備極尊榮，卻也盛極而衰，以至於飲恨成疾而崩逝。這場皇位之爭，不僅改變了答己的人生，也是元中期政治史上一大事件，甚至是答刺麻八剌一系掌控元朝帝位的開端，影響深遠。諸多學者已就該事件相繼發表論說，成果豐碩，不勝枚舉。近年論著富有新意與啟發者，應屬邱軼皓的研究。2011年，邱氏在其博士論文之中，特闢專章，利用譯注《瓦薩甫史》（*Tārīkh-i Wassāf al-Hazrat*）與《完者都史》（*Ta'rikh-i Ūljāitū Sultān*）兩部波斯文文獻有關這場政爭的紀錄——不見於漢文史籍的新材料，重新討論這場政爭的內因與各種政治勢力的動向，並提醒避免過度倚賴漢文或波斯文史料而有偏頗。²⁴以下擬在前人研究基礎之上，不再縷述事件始末，而將重點置於答己在政爭期間扮演的角色及其相關問題，提出個人的分析和推斷。

據波斯文文獻《瓦薩甫史》（1328年編成第5卷）載，元成宗曾想按照「蒙古人的風俗將〔答己〕收繼為妻」，但因引起成宗皇后卜魯罕（Buluyan, ?-1307）的憤恨和報復而未果。²⁵這是獨家的說法，中外史籍再無可供參證者。所謂蒙古人

²² 語見（元）揭傒斯著，李夢生標校，《揭傒斯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1，〈皇太后加尊號監修國史府賀表〉，頁263。賀表係於仁宗延祐二年（1315）進呈，「兩」開帝業云云，殆指先後扶立武宗與仁宗兩兄弟為帝。

²³ 答己曾在大德二年（1298）獲撥江南戶鈔32500戶，但具體分封州縣不詳。見（明）宋濂等撰，《元史》，卷95，〈食貨志三·歲賜·后妃公主〉，頁2424。此外，目前僅見兩條有關答己與佛教的材料，從中可知：她既在世祖至元晚期接受膽巴戒法，又在成宗即位隔年受膽巴影響，同其太后家姑頒旨護持地方尼寺。見王頌，《內陸亞洲史地求索》（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1），頁297-310；（元）趙孟頫，〈大元勅賜龍興寺大覺普慈廣照無上帝師之碑〉。趙碑係據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19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2001；26冊起改由鳳凰出版社印行，2004），頁304。碑中所列從受戒法名單，《全元文》讀作：「武宗皇帝、皇伯、晉王及今皇帝、皇太后」，共有五人。其中，今皇帝即仁宗，皇太后即答己，而將皇伯與晉王讀斷為二人，應是分別指稱甘麻剌及其子也孫鐵木兒。事實上，武宗與仁宗二朝所謂「皇伯晉王」，文獻可見用例無幾，但除〈膽巴碑〉外，都可確定是甘麻剌的專稱。見（明）宋濂等撰，《元史》，卷23，〈武宗紀二〉，頁525；（元）劉敏中著，鄧瑞全、謝輝校點，《劉敏中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卷4，〈敕賜駙馬趙王先德加封碑銘（皇慶元年）〉，頁46、47。

²⁴ 邱軼皓，〈蒙古帝國的權力結構〉，頁179-216。此章以〈見諸波斯史料的一場元代宮廷政變——以《瓦薩甫史》《完者都史》為中心的考察〉為題，先於2010年第五屆北京大學「伊朗學在中國」學術研討會發表，同題收入北京大學伊朗文化研究所編，《伊朗學在中國》，第5輯（上海：中西書局，2021），頁219-236。

²⁵ 本文援引《瓦薩甫史》，尚未出注，悉據邱軼皓漢文譯注本，唯其括注原文則予省略。見邱軼皓，〈蒙古帝國的權力結構〉，頁182-184。

收繼 (levirate and sororate) 風俗，亦即習稱的收繼婚制，是人類古老而普遍的重要婚制，也是行之已久的蒙古傳統。元朝建立前數百年，原蒙古人已經風行收繼婚，建立元朝以後仍然盛行。蒙古皇室有不少男女成員，曾被人收繼或收繼她人。答己是成宗兄妻，弟收兄妻，是蒙古人收繼婚類型之一，已有眾多前例可循，²⁶不無可能。

《瓦薩甫史》沒有寫下收繼一事發生的明確時間，但云：「一年前海山被派遣去〔隨同大軍〕指揮與依附海都的察八兒作戰。一年之後，『太子』和答己被貶謫往炎熱的省份。」察八兒 (Čapar, 生卒年不詳) 是海都 (Qaidu, 1234-1301) 之子，在海都死後由都哇 (Duwa, ?-1306) 扶立為窩闊台汗國 (Ögedei Khanate, 1224-1309) 的統治者。「依附海都」云云，海都疑是都哇之誤。海山與察八兒間的戰役，應指大德十年 (1306) 八月的也兒的石河 (Irtys, 今額爾齊斯河) 之戰。²⁷ 而答己與其子愛育黎拔力八達 (即引文所稱「太子」) 出居懷孟，在大德九年 (1305) 十月，是在戰前一年而非「一年之後」。《瓦薩甫史》敘事紀年明顯錯亂，²⁸無助於進一步判定收繼一事的確切年代。

按成宗倘欲收繼答己，理應早於答己母子的出居，可能更在大德九年 (1305) 六月冊封卜魯罕皇后子德壽 (1297-1305) 為皇太子前。杉山正明 (Sugiyama Masaaki) 曾經分析成宗希望收繼答己的可能原因，其說可以歸納為兩點：一，答己美貌出眾，成宗為之傾倒，「積極主動地邀請答己來到自己的後宮」。二，既能繼承亡兄遺產，更能收養其海山和愛育黎拔力八達兩位遺孤以為繼子，一舉兩得。²⁹ 第一點說法不免捕風捉影，並無實據，毋須深論。第二點可說是主要原因，畢竟收繼近支親屬的遺孀，在蒙古政治傳統中，堪稱整併對手實

²⁶ 洪金富，〈元代的收繼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世社會文化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頁 279-314。

²⁷ 劉迎勝，《察合台汗國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335-338。值得注意的是，杉山正明較早利用《瓦薩甫史》論述收繼一事，指出：當時成宗鐵穆耳已經臥病在床，握有實權的卜魯罕皇后於 1299 年 (大德三年) 先以本土防禦的美名，將答己的長子海山送往蒙古高原的最前線。見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國の興亡》，下冊 (東京：講談社，1996 一刷，2003 六刷)，頁 174。海山出鎮漠北的主導者，史無明言，但大德三年闊闊真太后仍然在世，恐怕無法任由卜魯罕皇后作主。而這個說法也與上引《瓦薩甫史》所謂海山與察八兒作戰云云，有所不符。

²⁸ 《瓦薩甫史》本章的紀年前後多有倒錯。見邱軼皓，〈蒙古帝國的權力結構〉，頁 190。

²⁹ 杉山正明著，孫越譯，《蒙古帝國的興亡》，下冊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頁 145。應當指出的是，杉山氏謂成宗當時「膝下無子」，不確。成宗子嗣的問題，考見上注 20。

力，並擴大自己影響力的捷徑。³⁰ 卜魯罕在大德三年（1299）十月獲授冊寶而為正宮皇后，³¹其子德壽日後即便有機會能取得皇太子地位，然其彼時因年幼而尚未被正式冊立，假使多了兩位已經成年的繼子，難保沒有變數。卜魯罕皇后感到憤恨，梗阻收繼，詔使答己母子就藩，也就理所當然。

答己與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宿衛諸臣於大德九年（1305）七月（一說十月）奉詔出居懷孟，獲賜金千兩、銀七萬五千兩、鈔十三萬錠。³² 清末屠寄（1856-1921）認為所賜金、銀、鈔數目可觀，幾乎沒有前例，可謂十分優厚。³³ 答己母

³⁰ 邱軼皓，〈蒙古帝國的權力結構〉，頁 191。

³¹ 成宗元妃失憐答里，弘吉剌氏。她過世的時間不詳，一般襲用錢大昕說，認為應在成宗即位前，並未被立為皇后。《史集》列記成宗即位大典出席名單，只見卜魯罕，沒有失憐答里，亦是她在此前已經亡故的證據。換言之，伯牙吾氏的卜魯罕是成宗第一任也是唯一的正宮皇后。見陳怡如，〈《元史》〈后妃傳〉與〈后妃表〉證補〉（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1），頁 15-16。屠寄曾經如此提出質疑：「至元三十一年，成宗即位之後，即立元妃翁吉剌氏為皇后，舊〈紀〉失書耳。」見屠寄，《蒙兀兒史記》（臺北：鼎文書局，影印本，1977 初版，1994 六版），卷 19，〈后妃傳·鐵穆耳汗失憐答里可敦〉，頁 10b。可惜的是，他並未提出具體證據。事實上，有一條材料值得注意。張伯淳《養蒙先生文集》卷 1 收錄〈皇后詔〉，有云：「天下之本在家，王化之基正始。朕誕膺明命，祇紹丕基，惟伉儷有繫于綱常，而位號宜崇于典禮。妃雅吉剌氏，……爰頒異數，用政中閭，可立為皇后。其合行典禮，令有司討論以聞。」根據張伯淳生卒年代（1243-1303）與生平歷官，這位被立為皇后的「妃雅吉剌氏」（目前檢得諸本《養蒙先生文集》，包括元至正六年（1346）張氏家塾刻明宣德七年（1432）遞修本與另兩種鈔本等三種，俱無異詞；《四庫》本《養蒙文集》則改作「妃鴻吉哩氏」），無疑就是成宗元妃失憐答里。失憐答里《元史》本傳提到她在「大德三年十月，立為后」（頁 2873），《元史》點校者已辨其誤，亦即大德三年（1299）所立者實為卜魯罕。卜魯罕《元史》本傳另謂：「元貞初，立為皇后。大德三年十月，授冊寶。」（頁 2873）屠寄認為元貞元年（1295）並無立后的記載，所謂元貞初只是「如云成宗即位初耳。」見毛海明，〈《元史·成宗紀一》至元三十一年史事箋證〉，劉迎勝主編，《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 32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頁 9。那麼，元貞初或是成宗即位初，立為皇后者，似即失憐答里。筆者對此抱持保留的態度。一，失憐答里假使曾經封后，卻在中外史冊上幾乎湮沒無聞，特別是武宗追諡冊文時但稱「先元妃」，太不合理。二，無獨有偶的是，英宗正后速哥八剌，亦啟烈氏，但在虞集所撰祔廟冊文，卻被寫作「翁吉剌氏」。誤載的原因不詳，但速哥八剌兄鐵失是「南坡之變」的禍首，多少有所關連。見劉曉，〈元代太廟制度三題〉，達力扎布主編，《中國邊疆民族研究》，第 7 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3），頁 67。卜魯罕皇后在大德末年政爭落敗，成王敗寇，相關紀錄遭到刪改，同樣不無可能。三，今存大德三年（1299）十月〈立皇后詔〉提到：「朕即位之初，立元勳世戚伯岳吾氏為皇后，然典禮未備」。見（元）不著撰人，洪金富校定，《洪金富校定本元典章》（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卷 1，〈詔令·成宗皇帝〉，頁 176。這與張伯淳所記，可說不謀而合，亦即成宗即位初年雖然立卜魯罕為后，但應由有司議行的典禮並未施行。綜言之，卜魯罕在元貞初年就已受封為皇后，大德元年（1297）生下一子德壽，兩年後正式獲授玉冊、玉寶，成為正宮皇后，更藉成宗病弱之機掌控朝政。而失憐答里雖為元妃，卻因早薨，沒有封后，也未獲諡。不過，時移勢易，武宗即位後流放卜魯罕，取消她的皇后地位，改上失憐答里尊諡，並升祔成宗殿室。

³²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21，〈成宗紀四〉，頁 464-465；（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24，〈仁宗紀一〉，頁 535。

³³ 屠寄，《蒙兀兒史記》，卷 11，〈愛育黎拔力八達可汗紀九〉，頁 1a。在此可以稍微作個比較。成宗於元貞二年（1296）十二月，訂定諸王朝會賞賜數額標準，主要分為太祖位與世祖位兩種：前者可得金各千兩、銀七萬五千兩，後者則為金各五百兩、銀二萬五千兩，餘各有差。答己母子出居所獲鈔錠不計，所得金數比照太祖諸子位下每年分賜額，銀數更是等同每年賜銀總數，殊為可觀。關於成宗朝朝會賞賜數額的討論，見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頁 254-259。

子一行到達懷孟的時間，《元史·仁宗紀》與答己本傳俱都繫於隔年十月。³⁴ 這是值得商榷的紀錄，而屠寄也有令人信服的辨正。屠氏主張所謂大德十年（1306）十二月至懷孟，十年應是九年之誤，亦即當年奉命就封，年底就已抵達。³⁵ 換言之，答己母子應於大德九年（1305）七月出就藩封，年底抵達懷孟，十一年（1307）正月動身返京，隔月就回到大都。答己母子在懷孟的時間，大約不足兩年。³⁶

答己母子出居懷孟，固然可能出自卜魯罕皇后的主導，或許還與前引《瓦薩甫史》所載收繼傳聞有關，但可以說是不合情理的貶謫嗎？屠寄的辨駁值得重視：「若以為不足歸咎成后者，而后妃舊傳徑稱大德十年，卜魯罕皇后謀貶順宗妃答吉及其子仁宗往懷孟。按八達汗年踰弱冠，出就父封，地屬畿甸，以此為貶，元史臣之曲筆也。且以出鎮懷孟為貶，豈當年忽必烈汗封皇孫答剌麻八剌於此，亦貶之耶？明初修史者無識，盲從其說。」³⁷ 從愛育黎拔力八達就封年紀與地點立說，並援世祖封答剌麻八剌事作為對照，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十分精采，足以信據。明初修史者沿襲元代史臣的曲筆，李則芬在為卜魯罕皇后的負面記載辨誣時，也提醒說道：「以上記錄，皆武宗、仁宗一派的片面之詞，殊難盡信。」³⁸ 援引相關資料時，無疑需要多加留心。茲再作補充與申說如下。

一，誠如屠寄所言，答己母子就藩理由確當，所獲賞賜豐厚，並未遭到刻意打壓。海山於大德三年（1299）出鎮漠北，當時尚無王封。隔年，受賜「皇太子寶」，並非受到冊封，只是便於指揮諸軍的權宜措施。大德八年（1304）十月，受

³⁴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24，頁 535；（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116，頁 2900。《元史》卜魯罕本傳記其「謀貶」答己母子，同樣繫其事於「大德十年」。

³⁵ 屠寄，《蒙兀兒史記》，卷 9，〈鐵穆耳可汗紀七〉，頁 24b-25a；屠寄，《蒙兀兒史記》，卷 11，〈愛育黎拔力八達可汗紀九〉，頁 1a。

³⁶ 《元史·李孟傳》稱「在懷州四年」（頁 4084），屠寄已辨其誤，見屠寄，《蒙兀兒史記》，卷 137，〈李孟傳〉，頁 1b。陳得芝撰文補正《元史·李孟傳》，並未提到這個錯誤。見陳得芝，〈《元史·李孟傳》訂補〉，劉迎勝主編，《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 22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11。屠寄的辨誤，但據《元史》成宗與仁宗兩〈紀〉相關文字推算，並未更引他證。事實上，姚燧撰〈河內李氏先德碣〉有云：「成廟賜名懷寧，以王今聖，時方撫軍于北，皇太后、儲皇往居者二年。」又在〈普慶寺碑〉提到：「前順考之國河內，未至而還，乃與今皇太后克成先志。出居二年。」見（元）姚燧著，查洪德編校，《姚燧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卷 26，頁 403；（元）姚燧著，查洪德編校，《姚燧集》，卷 11，頁 160。這兩條材料應該足以證明答己母子在懷孟不過兩年，並非於大德十年（1306）十二月抵達懷孟。

³⁷ 屠寄，《蒙兀兒史記》，卷 11，〈愛育黎拔力八達可汗紀九〉，頁 1a。

³⁸ 李則芬，《元史新講》，第 4 冊（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頁 184。

封為懷寧王，置王傅官，賜金印，原皇太子寶當已繳還。大德九年（1305）六月立德壽為皇太子，七月置懷寧王王府官。³⁹ 皇太子既已確立，海山王府又已告竣，答己與其長立的少子奉命往居，合情合理。姚燧（1238-1313）於仁宗朝奉敕撰寫〈普慶寺碑〉，甚至將答己母子此行，說成克竟答刺麻八剌未至而還的先志，並無絲毫貶意。⁴⁰

二，答己母子前往懷孟路上，雖說「從者單弱，多懷去計」，⁴¹卻也不乏「自請隨行」者，⁴²更且受到地方諸多款待，「所過郡縣，供帳華侈」。⁴³ 他們出居期間，行動並未受限，獲知成宗死訊後，二十四日內就能「奔還京師」，復居舊邸，「朝夕入奠」。⁴⁴ 卜魯罕皇后倘若存心貶斥，豈能不以為怪？

《元史·李孟傳》提到答己母子「又如官山」，《元史·曲樞傳》亦有「復之雲中」云云，「連年奔走不暇」。⁴⁵ 論者或謂答己母子再遭遷貶，⁴⁶筆者有不同的解讀。答己出居懷孟係屬就藩之行，在藩期間不足兩年，一再被迫移徙他地，殊難置信。事實上，官山在今內蒙古卓資縣北，⁴⁷其名始見於金代，境內有九十九泉的名勝，「六月亦雪」，⁴⁸是北方遊牧民族歷來觀光避暑的佳境。⁴⁹ 元代官山在宣寧縣城（治今內蒙古涼城）左近，可能為其所轄。⁵⁰ 雲中係元大同路（治今山西

³⁹ 張岱玉，〈《元史·諸王表》補證及部分諸王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頁170-172。

⁴⁰ （元）姚燧著，查洪德編校，《姚燧集》，卷11，頁160。

⁴¹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37，〈野訥傳〉，頁3313。「從者單弱」可能只是飾詞，畢竟「懷孟從行控鶴二百人」的規模，已與闊闊真太后於至元三十一年（1294）所有者相埒，不可謂少。見（明）宋濂等撰，《元史》，卷89，〈百官志五·儲政院·衛候直都指揮使司〉，頁2250。

⁴² （元）賈汝舟，〈重修邱氏先塋碑〉，（清）董濤，《曲陽金石錄》（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3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據清光緒三十年（1904）刊《重修曲陽縣志》卷11-13影印），卷13，頁65b。

⁴³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24，〈仁宗紀一〉，頁535。

⁴⁴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16，〈后妃傳二〉，頁2900。據《元史·仁宗紀》載，可知答己母子奔赴回京期間，既令祠比干於墓，又遇上大風雪等等（頁535-536），並非一路順暢。否則他們返京的日程只會更短。

⁴⁵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75，頁4084；卷137，頁3312。

⁴⁶ 邱軼皓，〈蒙古帝國的權力結構〉，頁192。

⁴⁷ 陳得芝，〈《元史·李孟傳》訂補〉，頁11。

⁴⁸ （宋）彭大雅撰，（宋）徐霆疏證，許全勝校注，《黑鞑事略校注》（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4），頁14。

⁴⁹ 孟克巴雅爾，〈歷史上的九十九泉〉，齊木德道爾吉主編，《蒙古史研究》，第10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0），頁34-53；王頌，《內陸亞洲史地求索（續）》（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2），頁249-263。

⁵⁰ 李逸友，〈內蒙古史跡叢考〉，魏堅主編，《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2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

大同)古稱,而宣寧為其屬縣。⁵¹ 答己母子到官山或雲中,疑即一事,可能是為住夏而來。另有一種可能是,答己當時「親至五臺,禱于佛乘」,祈求長子海山「早遂振旅」,⁵²之後順道往訪官山。

李孟(1255-1321)之父李唐(1226-1306)於大德九年(1305),其子「有扈從覃懷之行,公及家人長幼皆從」,隔年「從幸搯纂山,道賜藥餌,費錢三千緡。次冀寧。五月十二日,以疾終於玄都觀之松風堂,春秋八十有一。是冬南下,旅殯覃懷。」⁵³ 冀寧即今山西太原。搯纂山,其名殊奇,歷代文獻似乎別無所見。據姚燧撰〈考贈韓國忠獻公制〉載,李唐在其子入侍海山與愛育黎拔力八達兩位皇孫後,「凡太后之所如,必耄年而不後。輿疾河內,道卒冀方。」⁵⁴ 河內即上引之覃懷,亦即懷孟;冀方泛稱中原地區,應指上引之冀寧。搯纂山可能就在河南至山西的路上。⁵⁵ 綜言之,李唐父子於大德九年(1305)隨侍答己母子至懷孟後,隔年五月以前出發前往山西太原,⁵⁶目的應是至五臺山禮佛。禮佛之前或以後前往官山避暑,直至冬天才又回到懷孟。

答己母子之所以就藩,可能出於卜魯罕皇后的意旨,或許帶有政治考量,卻非報復性貶謫。他們不僅未遭軟禁,更未受限制,甚至獲得種種優待。這是卜魯

版社,1997),頁398。

⁵¹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58,〈地理志一·中書省〉,頁1375。

⁵² (元)姚燧著,查洪德編校,《姚燧集》,卷1,〈皇太后尊號玉冊文〉,頁6。答己曾經明白說道:「覃懷獲歸,弘濟聖業,非祖宗在天之靈默佑曲護,罔有今日,故力事崇構,資福於佛,為祖宗報。」見(元)許有壬著,傅瑛、雷近芳校點,《許有壬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卷46,〈敕賜順聖寺碑〉,頁537。她之後「再巡五臺」,興建殿閣,以及崇禮佛教種種作為,可說都是基於還願的心態。

⁵³ (元)劉敏中著,鄧瑞全、謝輝校點,《劉敏中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卷6,〈敕賜推忠保德佐運功臣……李公神道碑銘(皇慶元年)〉,頁69。

⁵⁴ (元)姚燧著,查洪德編校,《姚燧集》,卷2,頁41。

⁵⁵ 仁宗即位後曾有聖旨,提到:「在前我栲栳山回來時,到潞州呵,平陽的僧錄臘月八日,就潞州我的陸水寺裏,殺羊喚歹婦女每喫酒,又和尚每告他,則潞州裏要了玖拾餘定鈔來」。見(元)伯杭等纂,(元)張珪、(元)完顏納丹等續纂,方齡貴校注,《通制條格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29,〈僧道·詞訟〉,頁709。栲栳山似即搯纂山之異稱,《通制條格》校注者疑在山西潞安境內,實則可能就是山西五臺山之西臺。仁宗聖旨沒有明確年代,但他兩度隨侍答己至五臺山禮佛:一是大德末年出居懷孟期間,二是作為武宗皇太子之時。第二次時在至大二年(1311)正月之後,不得有「臘月(十二月)八日」事。因此,仁宗所見平陽僧錄事,極有可能是在準備返回懷孟的路上。

⁵⁶ 其中有兩點令人費解。李孟之父既卒於冀寧,但他現存的傳記資料(行狀與《元史》本傳)隻字不提,遑論曾否舉哀或服喪。此其一。其二,李唐原籍潞州上黨,與冀寧同在今山西省境內。據上注,答己母子可能途經潞州。李唐靈柩不即歸葬,卻是安厝於懷孟,直至六年之後(皇慶元年)才奉柩回葬。

罕皇后的失誤、大意或有其他原因，不得而知，⁵⁷卻為答己母子日後返京爭位得以成功，埋下了伏筆。

答己母子進入大都後，在哈剌哈孫（Qarqusun, 1257-1308）等人的支持及策應下，發動政變，順利擊敗卜魯罕皇后一派，取得政權。⁵⁸愛育黎拔力八達固然「躬定大事」，⁵⁹功不可沒，而答己同樣起到關鍵作用。愛育黎拔力八達當時並無封爵，必須「稟命太后」，方能「恭行天罰」。⁶⁰答己不僅具有象徵意義，更且實際勸說河南行省官員「毋忘世祖、裕宗在天之靈，盡力奉二皇子」，獲得其「願效死力」的承諾，以及贊襄謀畫的協助。⁶¹答己母子政變成功後，愛育黎拔力八達「入居東宮」，而由答己「垂簾」，準備「皇帝旦夕即位」的儀禮。⁶²這可說是先朝后妃負責籌辦選汗大會的蒙古傳統，只是別無其他史料可供論述答己在這段時間的作為。

答己母子政變得以成功，日本東洋史家岡田英弘（Okada Hidehiro, 1931-2017）如此解讀：「弘吉剌派之所以會擁立答剌麻八剌的遺子是因為他們的母親答己是弘吉剌氏按陳·那顏之孫渾都·帖木兒的女兒。」⁶³所謂「弘吉剌派」，源自岡田氏對於元朝政權的獨特理解。他主張：從至元十年（1273）察必（Čabi, ?-1281）成為世祖正宮皇后起，直至泰定帝（Yisün Temür, 1293-1328, 1323即位）之死（1328）的五十多年間，元廷是「以弘吉剌氏族為中心支撐皇帝權力的舊貴族

⁵⁷ 《元史·哈剌哈孫傳》提到當「時武宗撫軍北邊，仁宗侍太后在懷慶，諸奸臣謀斷北道」，可見手握兵權的海山才是卜魯罕皇后主要防範的對象，而非在懷孟的答己及愛育黎拔力八達。見（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36，頁3294。

⁵⁸ 哈剌哈孫在這場政變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畢竟他不僅控制當時的中樞機關，更掌握著都城的衛軍。這方面因與本文論旨關係不大，且論者已多，茲不贅述。概見蕭功秦，〈論元代皇位繼承問題——對一種舊傳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銳變過程的考察〉，《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期（1983），頁26-30。

⁵⁹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38，〈康里脫脫傳〉，頁3324。

⁶⁰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22，〈武宗紀一〉，頁479。

⁶¹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31，〈囊加歹傳〉，頁3185-3186。河南行省官員介入皇位之爭，以此為開端，但尚未動用到行省的職權與軍隊。直到兩都之爭（1328）時，更加發揮至關重大的作用。見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210-214。

⁶² （元）邵亨貞，《野處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卷3，〈元故嘉議大夫邵武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汪公行狀〉，頁4a。這裡或其他元代文獻提到卜魯罕皇后將要「垂簾」，或是有關脫列哥那的攝政與稱制，可能都是漢文史籍沿用漢人傳統制度的用語。倘從蒙古舊制的觀點而言，她們應是成為籌備召開選汗大會的負責人。見蔡美彪，〈脫列哥那哈敦史事考辨〉，氏著，《遼金元史考索》（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313。

⁶³ 岡田英弘著，陳心慧、羅盛吉譯，《從蒙古到大清——游牧帝國的崛起與承續》（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6），頁111。

勢力」為主，形成強大的弘吉剌派勢力，更可說是「弘吉剌時代」。⁶⁴ 這無疑是驚人的宏論，充分突顯元代后妃，特別是弘吉剌部出身者的重要性。

可惜的是，岡田英弘的說法即便言之成理，卻乏堅實論據的支持，值得商榷。從成吉思汗（Činggis Qan, 1206-1227）以至於元順帝妥懽貼睦爾（Toyōn Temür, 1320-1370, 1333 即位），蒙元諸帝固然不乏來自弘吉剌部的皇后，並多居正后之位，從而構成一個親緣關係相當穩固的世婚后族系統，在政治權力結構中具有顯要的地位。⁶⁵ 不過，元朝始終沒有形成如同遼代般龐大而強勢的后族，⁶⁶ 外戚世家只是「守藩封，食租賦、奉朝請而已」，⁶⁷ 對朝政的影響有限。此其一。其二，同出弘吉剌部，不定系出同支（主要是按陳系），闊闊真即是顯例。⁶⁸ 彼此無法一概而論，籠統地視作一個政治集團。其三，大德三年（1299）十月，非弘吉剌氏出身的卜魯罕被立為正宮皇后，當時闊闊真仍然在世，⁶⁹ 倘使確有所謂弘吉剌勢力的存在，豈能坐視。卜魯罕成為正宮皇后，應是她生有一子的緣故，可見有無子嗣比其出身氏族更為重要。⁷⁰

政變成功後，答己一度屬意由愛育黎拔力八達嗣位。海山出鎮漠北有年，「以

⁶⁴ 岡田英弘著，陳心慧、羅盛吉譯，《從蒙古到大清》，頁 49-50。

⁶⁵ 王曉清，《元代社會婚姻形態》，頁 71-73。該書統計弘吉剌氏皇后共十六位，不全，目前可知者至少有 22 位。參見陳怡如，〈《元史》〈后妃傳〉與〈后妃表〉證補〉，頁 2-3。

⁶⁶ 遼代后族蕭氏包括述律與審密兩大族系，兩大族系互不相容，而述律氏家族更是一再爭奪權位，直至亡國。見蔡美彪，〈遼代后族與遼季后妃三案〉，氏著，《遼金元史考索》，頁 125。

⁶⁷ （清）毛嶽生，《元書后妃公主列傳》（收入《二十四史訂補》，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據《漸學廬叢書》本影印），頁 1a-1b。

⁶⁸ 闊闊真並非元室世代通婚的特薛禪家族成員，甚至只是出自平常人家。見許正弘，〈論元朝闊闊真太后的崇佛〉，《中華佛學研究》，第 16 期（2015），頁 77。

⁶⁹ 卜魯罕於闊闊真在世時的事跡，漢文史籍未載，卻得見於藏文和回鶻文文獻。兩種非漢文文獻之所以存見卜魯罕其名，都與施刊佛經有關。1299 年，亦即大德三年，卜魯罕資助在大都刊印《莊嚴經論》與《量理寶藏及注疏》等六部藏文經書。其中，《量理寶藏及注疏》木刻板本是由察必皇后於 1280 年開始刻印，未成而卒，闊闊真接續完成，前後歷時四年。卜魯罕又據以重印兩百冊贈送學經者。婆媳三代傳承，象徵意味濃厚。在卜魯罕刊印經書的發願文裡，祈求當今皇帝、皇太后、皇后和子嗣等長壽安康，並願國泰民安。而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出土的印本殘片，編號 B464: 143，其回鶻語跋文提到：有人將不知名佛經重新刻板，並印一千份以分發眾人，以此祝願皇帝、皇太后和卜魯罕皇后應享的富貴和功德加倍增長。見西熱桑布，〈藏文「元版」考〉，《中國藏學》，第 85 期（2009），頁 44-45；阿不都熱西提·亞庫甫，〈敦煌北區石窟出土回鶻文文獻的綜合研究〉，彭金章主編，《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1），頁 462-463；阿不都熱西提·亞庫甫，《古代維吾爾語贊美詩和描寫性韻文的語文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頁 310-318。

⁷⁰ 元世祖冊封察必為后後，開始形成正宮皇后的概念，亦即：正宮皇后地位既居諸后之上且必擁冊寶，而有寶印方能頒發懿旨。見 George Q. Zhao and Richard W.L. Guisso, "Female Anxiety and Female Power," p. 18. 該文僅出一小注簡單提及，但這其實是一項極為重要的觀念轉換，值得深入考察。唯受限篇幅，且與本文主旨關係不大，有俟異日另文析論。

義割恩」，⁷¹而愛育黎拔力八達則長侍答己左右，「天下稱孝」。⁷² 兄弟兩人與答己的母子關係顯有親疏之別。答己褊袒少子，無論出於個人私情，抑或基於蒙古傳統，⁷³實為合情合理。

答己屢屢委請陰陽家卜算，藉以傳達個人的訴求。先是推算海山兄弟二人星命，「問所宜立」，得出兄凶弟吉的結果，試圖用來勸說海山主動放棄皇位。⁷⁴ 武宗入繼大統時，答己再次命人卜算即位日期，⁷⁵可能別有所圖。她勸退長子海山，或是仿照闊闊真當年支持末子鐵穆耳登基的模式，冀望海山比照當年的甘麻剌仍然鎮守北疆。⁷⁶ 但是，海山拒絕接受，派人「往察事機」，並親率大軍向南進發，迫使答己和愛育黎拔力八達只能表明擁戴之意。⁷⁷ 最終在阿沙不花（*Aša-Buqa, 1263-1309）與康里脫脫（K'ang-li Toqto, 1272-1327）兄弟居間斡旋下，母子三人達成「兄弟叔姪世世相承」的協議，⁷⁸亦即後世習稱「武仁授受」的約定，並藉以換取三人相安共處的局面。

參、三宮協和：答己太后與武宗朝政局

大德十一年（1307）五月，海山在上都（治今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正藍旗）登上皇位，是為後世習稱的武宗。武宗即位後，即日追尊亡父答剌麻八剌為皇帝，並尊其母答己為皇太后。隔月，詔立愛育黎拔力八達為皇太子，授予金

⁷¹（元）姚燧著，查洪德編校，《姚燧集》，卷1，〈皇太后尊號玉冊文〉，頁6。

⁷²（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75，〈李孟傳〉，頁4085。

⁷³蒙古家族原本存在幼子守灶的風俗，亦即所謂末子相續制度。參見島田正郎，《北亞洲法制史》（臺北：中國文化學院，1964），頁19-20；後藤富男，《內陸アジア遊牧民社会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8），頁233-249。唯在元朝屢見不鮮的皇位爭奪戰中，末子身分似乎不是一種可供運用，至少未見諸宣傳的政治資本。

⁷⁴（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16，〈后妃傳二〉，頁2900；卷138，〈康里脫脫傳〉，頁3322。

⁷⁵（元）蘇天爵著，陳高華、孟繁清點校，《滋溪文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9，〈元故太史院使贈翰林學士齊文懿公神道碑銘〉，頁129。蒙元皇帝普遍採用生辰占星術以為即位大典推算吉日，見周思成，〈元朝皇帝與星命、相術之關係新證〉，《北方文物》，第4期（2016），頁96-98。

⁷⁶傅光森，《元朝中葉中央權力結構與政治生態》（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頁127。關於成宗鐵穆耳的即位及其意義，必須重新審視其前若干關鍵年分的政治事件，方得有一較為全面的認識。見許正弘，〈元成宗繼位問題探析〉，《清華學報》，新51卷第3期（2021），頁473-512。

⁷⁷趙文坦，〈元武宗改皇儲事件發微〉，《中國史研究》，第2期（2005），頁103-104。

⁷⁸（明）宋濂等撰，《元史》，卷116，〈后妃傳二〉，頁2901；卷138，〈康里脫脫傳〉，頁3323-3324。

寶。⁷⁹ 武宗後為答己新建興聖宮，皇太子則居東宮（太后原本所居之隆福宮），兩宮逐漸成為相對獨立的兩個政治中心，連同皇宮，形成所謂「三宮協和」的政治新局。⁸⁰ 在武宗即位不到四個月，亦即愛育黎拔力八達被立為太子的三個月後，易州涑水縣（治今河北涑水）金山寺於重陽日舉行太平會，特別銘石為記，祈祝「皇太后聖壽無疆，當今皇帝聖壽萬安，東宮位福壽千秋，相哥公主壽等千春。」⁸¹ 相哥公主即祥哥剌吉（ca. 1283-1331），係武宗之妹、仁宗之姐。將答己一家並列，而以雙抬表示皇帝為尊，太后和太子同時單抬居次，公主則在最末；祝禱用詞顯經斟酌。從中不僅清楚可辨各人政治地位，也讓人想見當時三宮並立的政治情勢。⁸² 張養浩（1270-1329）曾在武宗朝進呈〈時政書〉萬餘言，列舉當朝十大弊端，其七曰倖門太多，提到：「次天子而尊，則太后焉；次太后而尊者，則皇太子焉。雖親且貴，要皆人臣，事無專制，義無獨行，所謂尊無二上者是已。」⁸³ 對於三宮鼎立的局面，「尊無二上」云云，可說是婉轉卻也不失到位的批評。

答己接收並擴大闊闊真死後未被廢罷的太后位下官署——徽政院，愛育黎拔力八達則另置詹事院，兩院成為太后和太子運作政治權力的重要基礎。⁸⁴ 徽政院

⁷⁹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22，〈武宗紀一〉，頁 479-480。

⁸⁰ 語見（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116，〈后妃傳二〉，頁 2901。另據《元史》載，興聖宮始建於至大元年（1308）三月，隔年五月尚有「董建」云云，三年四月仍有「備興聖宮營繕」句，同年十月則見皇帝率同皇太子、諸王與群臣「朝興聖宮」事。易言之，興聖宮應在至大三年四月之後，十月以前落成。見（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22，〈武宗紀一〉，頁 497；（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23〈武宗紀二〉，頁 511、524、527。興聖宮落成之前，皇太后可能與皇太子都住在隆福宮（後改光天殿）。

⁸¹ 茲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簡稱傅圖）藏拓。傅圖原題〈元金山衲衣禪師塔記〉，有誤，今從洪金富主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元代石刻拓本目錄》改題〈千佛舍利寶塔記〉。見洪金富主編，許正弘等助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元代石刻拓本目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7），頁 121。此段銘記刻於金山寺千佛舍利寶塔塔身南向正面下半部，而該塔創建於大德四年（1300）以前。見朱學武，〈涑水縣古塔綜述〉，《文物春秋》，第 4 期（1993），頁 68。

⁸²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文獻之中，《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 5、《悲華經》卷 9 與《經律異相》卷 15 各有祝贊四面，祝贊以西夏文題款，譯文為：「奉大元國天下一統世上獨尊福智名德俱集當今皇帝聖壽萬歲敕，印制一全大藏經流行，當今皇帝聖壽萬歲，太后皇后與天壽等，奉敕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皇太子壽長使見千秋，印大藏經五十部流行」。見杜建錄，《中國藏西夏文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見 177。筆者不識西夏文，無法檢驗正確與否，但譯文顯然有疑。其中，「太后皇后」云云，武宗至大三年（1310）正月始立真哥為皇后，頗疑應是「皇太后」之誤。祝贊文應與金山寺的〈千佛舍利寶塔記〉類同，列舉當今皇帝、皇太后與皇太子三宮同受祝福，而其時間更早，就在愛育黎拔力八達被立為皇太子的二十四日後。

⁸³ 陳得芝、邱樹森、何兆吉輯點，《元代奏議集錄》，下冊，頁 195。

⁸⁴ 元代歷朝徽政院的沿革，歷次詹事院的置廢及其與徽政院的關係，概見方廣錫，〈元史考證兩篇〉，《文史》，第 29 輯（1988），頁 229-240；小畑是也，〈元朝詹事院制度研究〉，《史學研究》，第 207 號（1995），頁 46-69；高仁，〈元代詹事院新考〉，姜錫東主編，《宋史研究論叢》第 18 輯（保定：河北

在武宗朝陞改與增設不少司屬，組織更趨龐大。武宗即位當年陞改司屬，包括：掌謁司陞為正三品、衛候直都指揮使司為正四品、嘉醞司改掌飲司並陞正四品、隨路諸色人匠都總管府改繕珍司。增設或改隸司屬則有：延福司、上都掌儀署、管領大都等路打捕鷹房膳粉人戶總管府、柴炭局等。至大元年（1308）添設甄用監。兩年後，又增設章慶使司與管領怯憐口（*ger-ün ke'üd*，蒙語「家中兒郎」之意）諸色民匠總管府，增隸管領本位下怯憐口隨路諸色民匠打捕鷹房都總管府，並為左都威衛使司立千戶所一與百戶翼八。⁸⁵ 此外，武宗陸續撥奉龍興（治今江西南昌）、⁸⁶瑞州（治今江西高安）與松江府（治今上海松江），⁸⁷以及平江（治今江蘇蘇州）等八路為答己太后湯沐邑，⁸⁸並將瑞州蒙山銀場撥屬徽政院。⁸⁹ 其中，光是龍興、瑞州於至大四年（1311）徵收茶課數額即有十七萬餘錠。⁹⁰ 另又設立江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歲集褚泉三百餘萬緡、米百餘萬石於江淮數千里之地」，選任具清峻風操的官員，特予外任僅見的三品銀印，⁹¹「其秩數優崇，隱然列郡之上。」⁹² 而這些徽政院負責管理的湯沐邑與軍民諸色人匠等戶，往往享有種種特權：「除本位下合納的差稅外，不揀甚麼差（撥）〔發〕、和雇和買、雜泛夫役，休科要、搔擾者。來往的使臣每，休安下者。諸人休爭要者。但有的勾當，

大學出版社，2016），頁 420-436。關於元朝闊闊真、答己與卜答失里等三位太后位下徽政院建置與政局的發展，詳見筆者先後發表的三篇論文，分別為〈闊闊真太后與元成宗朝政治——兼論太后位下徽政院的建立〉，《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66 期（2021），頁 45-84；〈元答己太后政治集團與仁英二朝政局〉，頁 1-44；〈權守上位——卜答失里太后與晚元初期政治〉，《漢學研究》，第 38 卷第 2 期（2020），頁 171-214。另，最近的研究論著，見李心宇，〈元代徽政院研究〉，劉迎勝主編，《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 40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頁 75-90。此文在官員輯考方面頗有創獲，可惜的是對前人研究成果之吸收稍嫌不足。

⁸⁵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89，〈百官志五〉，頁 2246-2250、2253-2257。上都掌儀署與至大四年（1311）增設的上都掌設署，是目前可見徽政院轄屬唯二的上都分司。見葉新民，〈元上都的官署〉，《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 期（1983），頁 79-92。

⁸⁶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94，〈食貨志二·茶法〉，頁 2394。

⁸⁷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94，〈食貨志二·茶法〉，頁 2394；（元）趙孟頫，〈仁濟橋記〉，（明）鄭璠等修，（明）熊相纂，《瑞州府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據明正德（1506-1521）刊本影印），卷 13，頁 40a；（明）顧清等修，《松江府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據明正德（1506-1521）刊本影印），卷 22，〈守令題名·元·題名記〉，頁 9a。

⁸⁸ （元）虞集著，王頌點校，《虞集全集》，下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清河郡侯張公（瑾）神道碑〔銘〕〉，頁 1140。

⁸⁹ （元）許有壬著，傅瑛、雷近芳校點，《許有壬集》，卷 75，〈蒙山銀〉，頁 803。

⁹⁰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94，〈食貨志二·茶法〉，頁 2394。

⁹¹ （元）許有壬著，傅瑛、雷近芳校點，《許有壬集》，卷 37，〈兩淮屯田打捕都總管府記〉，頁 454。

⁹² （元）陳旅，《陳眾仲文集》（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叢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至正刻明修本（卷 8-13 配清鈔本）影印），卷 9，〈江淮等處財賦都總管府題名記〉，頁 3a-3b。

省裏、臺裏、諸衙門，都休問者，交徽政院本位下官人每問者。」⁹³

儘管三宮鼎立，各自形成政治中心，但皇太后與皇太子顯然屬於同一陣線。前已提到，答己褊袒少子，希望讓愛育黎拔力八達登上皇位，終因迫於海山兵威而作罷。愛育黎拔力八達長年侍奉答己，偕同出居懷孟藩邸，從臣逐漸形成一個政治集團。傅光森將之稱作「懷孟集團」，認為是以李孟與數位色目官員為主的鬆散政治勢力，進而詳論該集團在大德末年政變的表現，並在仁宗朝成為儒治化的核心力量。⁹⁴ 可以補充的是，這個集團的成員隨侍前往懷孟時，其實應該都是屬於答己的「宮僚」。⁹⁵ 其後，這些人在武宗朝大多進入皇太子詹事院，成為仁宗的潛邸舊臣，而在仁宗朝分別位居要津。⁹⁶ 其中，李孟是個值得注意的例子。李孟雖是漢人，但作為答己宮僚，隨從出居懷孟，並在帝位之爭出謀畫策，立下大功。武宗即位前，一度受到疑忌而逃去，下落不明。至大三年（1310），李孟奉召入見，特授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徽政院事。仁宗繼位後，方才真拜中書平章政事，⁹⁷可見此前實在太后的徽政院供職。李孟與答己關係密切，他的繼配就是答己所賜。⁹⁸

武宗冊立親弟為皇太子，賦予莫大權力，「領中書令、樞密使，百揆機務，聽所總裁」，⁹⁹允許「班朝諸司，聽皇太子各置一人。」¹⁰⁰ 愛育黎拔力八達作為皇太子，既擁建置龐大的詹事院，又得指揮中書省，積極涉入政務，而與武宗共享政權，可說是共天下的「副皇」。他的權勢與地位，在元代歷任皇太子之中，罕有其比。¹⁰¹ 對照之下，答己太后在武宗朝即便尊貴無比，其位下徽政院司屬儘管多有

⁹³ （元）不著撰人，洪金富校定，《洪金富校定本元典章》，卷 25，〈戶部十一·減差·納綿府雜泛〉，頁 910。這是大德十一年（1307）九月二十八日，由詹事院奏奉皇太子令旨而再次得到確認的特權。不到兩個月後，就經武宗同意頒詔確定。見（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22，〈武宗紀一〉，頁 491。

⁹⁴ 傅光森，《元朝中葉中央權力結構與政治生態》，頁 127-130，202-206。

⁹⁵ （元）黃潛著，王頤點校，《黃潛全集》，上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元故翰林學士承旨……諡文忠李公（孟）行狀〉，頁 419。

⁹⁶ 小畑是也，〈元朝詹事院制度研究〉，頁 59-60。

⁹⁷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175，〈李孟傳〉，頁 4087。

⁹⁸ （元）黃潛著，王頤點校，《黃潛全集》，上冊，〈元故翰林學士承旨……諡文忠李公（孟）行狀〉，頁 420。

⁹⁹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24，〈仁宗紀一〉，頁 539-540。

¹⁰⁰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22，〈武宗紀一〉，頁 481。

¹⁰¹ 劉曉，〈「南坡之變」畧議〉，頁 50-51；陳一鳴，〈論元代的太子參政問題〉，《內蒙古社會科學》，第 1 期（1992），頁 83-85。此外，元代中後期皇帝受個人性格、能力以至於時局所限，普遍缺乏從政熱情。見張帆，〈《元典章·新集》的一條文書看元朝中後期的御前奏聞決策機制——兼析《新元史》等

陞改，卻都未能留下太多的政治表現。這可能是有位強勢皇太子居間代勞的緣故。有學者認為答己對朝政的干預有限，原因是她曾用陰陽家言勸退海山而遭忌忿。¹⁰² 這個推測不無可能，但乏確證，畢竟武宗最應防範的應是其弟，而非再與其母為敵。

當時在徽政院任官至今可考者，甚至屈指可數。除上文提到李孟曾任同知徽政院事外，另有床兀兒（Chong'ur, 1260-1322）也以同官加拜中書平章政事。¹⁰³ 王慶端（1225-1304）子王桓（生卒年不詳），子繼父業，父子先後供職徽政院與左都威衛使司。王桓於大德末年率衛兵輔立武宗有功，進資德大夫、徽政副使。¹⁰⁴

至於最重要的院使方面，史料存見無幾，目前暫得二例。其一是塔刺海（Taraqai, ?-1308）。他從大德元年（1297）起，直到至大元年（1308）過世，雖然迭加要職，但始終擔任徽政院院使，前後凡十二年。¹⁰⁵ 其二是瓜頭（1286-?）。據《元史·武宗紀》載，大德十一年（1307）六月，有徽政院使瓜頭等奏：「別不花以私錢建寺，為國祝釐。其父為諸王斡忽所害，請賜以斡忽所得歲賜。」¹⁰⁶ 瓜頭，一譯歪頭，月赤察兒（Öčič'er, 1249-1311）第三子，塔刺海異母弟。他在《元史》無傳，生平附見元明善（1269-1322）所撰〈太師淇陽忠武王碑〉。¹⁰⁷ 據碑載，瓜頭在大德十一年（1307）六月，特授榮祿大夫、宣徽院使。

書的相關謬誤》，方鐵、鄒建達主編，《中國蒙元史學術研討會暨方齡貴教授九十華誕慶祝會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頁 272。仁宗在皇太子階段積極涉政，固然有其政治考量，卻也十分罕見。

¹⁰² 姚大力，〈元仁宗與中元政治〉，氏著，《蒙元制度與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 374。

¹⁰³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22，〈武宗紀一〉，頁 479-480。按：同條二見床兀兒名，疑是二人，另一人為文宗朝權臣燕帖木兒之父。

¹⁰⁴ （明）李正儒創修，（清）賴于宣重輯，（清）汪度續修，《藁城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據明嘉靖十三年（1534）刊民國二十三年（1934）鉛字重印本影印），卷 5，〈恩例志·勳戚〉，頁 3a。

¹⁰⁵ （元）元明善撰，（清）繆荃孫輯，《清河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據清光緒、宣統間刊《藕香零拾》本影印），卷 2，〈太師淇陽忠武王碑〉，頁 14a-14b。有關塔刺海與徽政院在成宗朝的建立，見許正弘，〈闊闊真太后與元成宗朝政治〉，頁 61-73。

¹⁰⁶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22，〈武宗紀一〉，頁 481。

¹⁰⁷ （元）元明善撰，（清）繆荃孫輯，《清河集》，卷 2，〈太師淇陽忠武王碑〉，頁 15a-15b。碑文紀事止於皇慶元年。瓜頭後得賜名脫兒赤顏，雖是一代重臣，相關記載卻十分有限。有學者認為延祐三年支持武宗子和世㻋謀反失敗而被殺的阿思罕（一作阿撒罕），應即瓜頭。見傅光森，《元朝中葉中央權力結構與政治生態》，頁 187-191。只是瓜頭既得賜名，緣何又有別名，恐怕尚待釋疑。

或謂瓜頭當時侍奉答己母子，應以《元史》的記載為是，亦即碑文的宣徽院使乃徽政院使之訛。¹⁰⁸ 這個說法可能有點問題。一，侍奉答己母子與後來出任官職，不一定有關，即便相關，也難以肯定必為徽政院使。二，據碑載，瓜頭後於至大元年（1308）十月拜太師，兼任諸使「如故」。所列諸使，只見宣徽使，並無徽政使。兩處碑文俱誤，可能性不大。而月赤察兒與塔剌海父子擔任或兼任宣徽院使，瓜頭被授同官，理所當然。三，瓜頭的建言與諸王歲賜有關，而這正是宣徽院而非徽政院的職掌。¹⁰⁹ 另有一例比較特殊。常普蘭奚（Buralqi, 1270-?），八歲就被真金收養入宮，後於武宗即位入侍答己，「進徽政使，固辭，乃以為同知徽政事。」直至仁宗延祐二年（1315）冬，方加金紫光祿大夫、徽政院使。¹¹⁰ 綜言之，武宗朝徽政院使至今僅能確知塔剌海一人，而他在任同時是否另有其他院使，至大元年（1308）過世之後是否別有繼任人選，院務如何運作，種種問題，都已難以詳考。

答己及其侍臣對武宗朝朝政的影響，方臣祐（1267-1343）是個值得注意的人物。方臣祐，小字小公，高麗尚州中牟（治今大韓民國慶尚北道尚州市）人。他在高麗忠烈王（1236-1308, 1274 即位）時入宮供職，而於至元二十六年（1289）隨從公主至元廷謁見闊闕真，獲得留用，並賜名忙古歹（Manggudai），成為高麗第一批貢納元廷的宦官。¹¹¹ 此後，他歷事七朝與闊闕真、答己兩位太后，「參掌機密」，累次獲賜珍寶及田產「不可勝計」，備受榮寵。然而，這樣一位顯赫人物，中國史料卻未留下紀錄，幸賴高麗史籍存見其事，不至於湮沒無聞。¹¹²

方臣祐在《高麗史》有傳，生平歷官另詳於其國人李齊賢（1287-1367）所撰

¹⁰⁸ 陳得芝主編，《中國通史·中古時代·元時期》，下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320。

¹⁰⁹ 宣徽院職掌諸王朝會賞賜，見達力扎布，〈元朝宣徽院的機構和職司〉，《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期（1987），頁47-48。

¹¹⁰ （元）程鉅夫著，張文瀾校點，《程鉅夫集》，卷7，〈信都常忠懿王神道碑〉，頁81。據《元史·寧宗紀》載，至順三年（1332）十月，「提調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伯撒里、右都威衛都指揮使常不蘭奚，並為徽政使。」（頁812）常不蘭奚即常普蘭奚，他在至順三年（1332）再次回任徽政院使，已逾六旬。此外，《元史》提到另一位擔任徽政院使的「普蘭奚」。他是蒙古克烈氏明安答兒（?-1253）末子，至大初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程鉅夫集》，卷15，頁175），出任院使時間有待考訂。

¹¹¹ 高麗籍宦官較早入元並獲重用者，可以李大順、趙芳與方臣祐等人作為代表。見李玠爽，〈元宮廷의 高麗 宦官의 關係〉，《東洋史學研究》，第113期（2010），頁157。

¹¹² 巧合的是，當時高麗僧人入元者甚眾，但在元代文獻方面的記述同樣十分有限。其中，義璇即便貴為大都皇家佛寺大天源延聖寺住持，也不例外。見許正弘，〈元高麗僧義璇生平事跡考〉，《中華佛學研究》，第11期（2010），頁45-75。

〈光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洛府院君方公祠堂碑〉。¹¹³ 綜合其傳、碑記載，可知方臣祐仕履：在闊闢真太后時，他初授奉政大夫、掌謁司丞（俱為正五品），尋加通奉大夫、泉府太卿（俱為從二品）。掌謁司為徽政院司屬，負責掌管皇太后寶印，「以宦者為之」。¹¹⁴ 泉府司，職掌「御位下及皇太子、皇太后、諸王出納金銀事」。¹¹⁵ 而他真正對於朝政有所影響，要到答己太后時期。武宗朝，方臣祐事答己太后，改將作院使，進階正奉大夫、兼掌謁司卿，再進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仍依前將作院使、掌謁司卿。至大二年（1309）三月，遼陽行省右丞洪重喜（？-1310）告發高麗忠宣王王璋（1275-1325, 1295、1308-1313 在位）不奉國法、恣暴等事¹¹⁶中書省遂請令洪重喜與高麗王廷辯。¹¹⁷ 方臣祐入侍興聖宮時，藉機跪奏答己太后。太后感悟，向武宗進言，於是武宗敕令中書省不必辯對，並即日斥去洪重喜。此一事件，除在元麗關係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另有幾點值得思考的問題。一，這是答己在武宗朝難得干涉朝政的明確紀錄。二，方臣祐只是太后徽政院轄下掌謁司長官，因有親近太后而得到進言的機會，就能成為左右高麗國勢的關鍵。作為頂頭上司的徽政院院使，其權勢不難想像，惜無留下任何記載。三，方臣祐其人其事，特別是他的宦官身份，元代史料竟都隻字未載，倘無高麗文獻，恐已不得而知。《元史·宦者傳》立傳者只有兩人，南宋與高麗人各一，固然具有代表性，卻顯有不足。而這些高麗籍宦者的政治勢力，以及宦者擔任官員的問題，仍然有待深究。

至大元年（1308）開始推行的大護國仁王寺寺產清理，是另一值得討論的事

¹¹³ （朝鮮）鄭麟趾等著，孫曉主編，《高麗史》，卷 122，〈宦者傳〉，頁 3712-3713；（高麗）李齊賢，《益齋先生亂筆》（收入《麗季名賢集》，漢城：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1959，據朝鮮純祖十四年（1814）甲戌補刊本影印），卷 7，〈光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洛府院君方公祠堂碑〉，頁 2b-5b。關於方臣祐的研究，元代宦官（高麗宦官）或高麗人入元（元麗交流）相關論著多有討論，專文則見高惠玲，〈方臣祐（1267-1343）小論〉，高柄翊先生回甲紀念史學論叢刊行委員會編，《歷史斗人間의 對應：高柄翊先生回甲紀念史學論叢》（漢城：한울出版社，1984），頁 753-769。他的事跡及其意義，下文將另有所論。

¹¹⁴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18，〈成宗紀一〉，頁 392。

¹¹⁵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11，〈世祖紀八〉，頁 227。

¹¹⁶ 此事發生的時間，方臣祐《高麗史》本傳但云「忠宣時」，〈方公祠堂碑〉則謂在「至大間」，並不明確。《元史·武宗紀二》同載其事，繫於至大二年（1309）三月，只記始末，而略去處置過程與關鍵人物（頁 510）。此外，洪重喜出身遼陽洪氏家族，祖孫三代受到元廷重用，而與高麗王室屢有爭抗，在蒙麗關係史中扮演重要角色。見于磊，〈遼陽洪氏家族與高麗王室關係述論——以蒙麗關係史為視角〉，中國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 13 輯（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頁 303-309。

¹¹⁷ 廷辯是元朝特別的政治運作及決策方式，係採當事人雙方當面對質、對辯的形式，爭論某一具體事件或人物的是非功罪。見王敬松，〈元朝的廷辯〉，《民族研究》，第 3 期（2002），頁 84-93。

件。仁王寺係由世祖皇后察必倡修，始建於至元七年（1270）十二月，落成於至元十一年（1274）三月，歷時約三年。該寺與萬安、興教二寺並稱都城三大刹，可說是元朝最為顯赫的皇家佛寺之一。仁王寺獲得來自以察必為主的支持與賞賜，寺產相當豐厚可觀，殿宇房舍之外，不僅擁有水田、旱地十萬餘頃，另有山林、河泊、湖渡、玉石、煤炭等產業，轄下內外人戶更是多達三萬七千餘戶。¹¹⁸然而，由於管理不當，在至大元年（1308）時，已是「田失故額，租賦不登，寺之賴日以削。」答己太后有感於察必「經始之仁，罷總管府，建會福院」，展開全面清查，歷經四年，「始仍舊貫，視常歲之入相倍蓰焉。」¹¹⁹ 答己所以發起與主導的寺產清理，有學者解釋為：仁王寺經營不善，其實是成宗朝弘吉剌部皇后（失憐答里）與皇太后（闊闊真）的相繼逝世，加上出身伯牙吾氏（Baya'ut）的成宗皇后卜魯罕勢力崛起，因而失去有力的庇護。答己改革則是象徵弘吉剌部皇后權力的重興。¹²⁰ 這個說法有其道理，但也有難以解釋的矛盾：卜魯罕皇后既然大權在握，仁王寺如此龐大的產業，理應納入掌控，更加增強本身實力。¹²¹ 無論如何，會福院負責管理的仁王寺寺產，肯定大大擴充答己的財富基礎。

此外，答己在五臺山建寺與用內降旨干政，可說是她在武宗朝較受注目，或者說是備受批評的兩件事。嚴格來說，其實不必太過苛責。答己建寺大致仍遵闊闊真「故事」而行，並未引起太大風波。¹²² 內旨干政與元代中後期屢禁不止的「隔越奏請」現象有關，亦即怯薛（kešig，蒙語「番衛」之意）成員受人請託，利用接近皇帝之便，不經中書省等官署，就直接奏准皇帝而取得聖旨。¹²³ 世祖朝在至元二十年（1283）起，就開始出現近侍為人求官紊亂選法的情況，而忽必烈本人也有意利用近侍充當耳目。成宗大德六年（1302）至武宗至大元年（1308），短短六年期間，「璽書不由中書」者就有六千三百餘道，平均每年千餘道。數量極

¹¹⁸ 顧寅森，〈元大護國仁王寺名稱、地址考略〉，劉迎勝主編，《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 23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60。

¹¹⁹ （元）程鉅夫著，張文樹校點，《程鉅夫集》，卷 9，〈大護國仁王寺恒產之碑〉，頁 95。關於仁王寺的寺產，詳見中村淳，〈元代大都勅建寺院的寺產——大護國仁王寺を中心として〉，《駒澤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第 71 號（2013），頁 1-28。

¹²⁰ 中村淳著，寶力格譯，〈元大都勅建寺院概述〉，《蒙古學信息》，第 1 期（2003），頁 27-29。

¹²¹ 植松正已經指出成宗朝朱清、張瑄案的起因，即是由於成宗皇后卜魯罕為增強本身財力，以備於成宗死後掌握帝位。見植松正，〈元代江南の豪民朱清・張瑄について——その誅殺と財産官没をめぐる〉，氏著，《元代江南政治社會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7），頁 297-335。

¹²²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99，〈兵志二・宿衛・扈從軍〉，頁 2536。

¹²³ 張帆，〈元朝詔敕制度研究〉，《國學研究》，第 10 卷（2002），頁 144。

為可觀之外，涉及層面亦復廣泛，包括「田土、戶口、金銀鐵冶、增餘課程、進貢奇貨、錢穀、選法、詞訟、造作等事」。¹²⁴ 此後，近侍亂政情況仍然屢見不鮮，屢禁不絕，直至元朝統治結束。¹²⁵ 武宗一朝，這些奉旨「要索官階」的怯薛近侍們，往往各奉三宮內降的聖旨、懿旨與令旨，¹²⁶其中無法排除有答己太后的授意，卻也不能完全歸咎於她。而皇太后與皇太子「兩宮近侍遷敘，惟上所命」，可見皇帝仍然有權加以裁抑。¹²⁷ 此外，有學者認為武宗時十一寺、監陞院，「大概都是太后所授意」，¹²⁸沒有其他證據前，實在不宜輕下如此論斷。

肆、結語

本文深入考察答己在仁宗朝前的政治活動，試圖解釋她取得政治權力的基礎和擴大政治影響力的緣由，增益吾人對於元中期政治史的理解。茲據研究所得，結合元代相關史事，歸納要點如下，以為全文作結。

首先是答己政治權力的來源。答己出自同元室世代通婚的弘吉剌部特薛禪一族，但可能只是支系，而她的夫婿答剌麻八剌貴為世祖皇太子真金次子，卻疑似天生啞疾且又死於盛年。倘無其他變數，答己應該會以宗王元妃或遺孀的身分，守寡而歿，僅在史冊上被一筆帶過。她的政治生命所以獲得翻轉，關鍵就在於她有兩名順利長大成人的兒子。這兩名兒子成為答己最重要的政治資本，終於在大德末年的皇位爭奪戰中，成功兌現為實質權勢。從此以後，元朝帝位幾乎都在答己子孫掌握之中。

元朝三位太后之中，闊闊真作為已故皇太子真金元妃，卜答失里（Budaširi, 1307-1340）作為前帝，亦即文宗（Tuy Temür, 1304-1332, 1328、1329 即位）正宮

¹²⁴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23，〈武宗紀二〉，頁 509。

¹²⁵ 周良霄，《忽必烈》（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頁 201。

¹²⁶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23，〈武宗紀二〉，頁 516、522。


¹²⁷ （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22，〈武宗紀一〉，頁 487。

¹²⁸ 李則芬，《元史新講》，第 3 冊（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頁 356。

皇后，答己宗王元妃的地位顯然無法相提並論，而她在取得政權、開創帝業的參與程度，則非前二者所能企及。成宗朝末年的這場皇位之爭，對於元代政治的影響重大，歷來論者不乏其人。本文重新審視這場政爭，肯定屠寄的說法，認為答己偕同少子愛育黎拔力八達出居懷孟，可能出自卜魯罕皇后的意向，或許與成宗試圖收繼答己有關，卻是正常的宗王就藩，並非刻意打壓。答己母子享有種種優待，行動自如，並得在成宗過世後，迅即返回大都爭奪大位。所謂卜魯罕皇后貶謫云云，不妨視為用來醜詆失敗者的官方說法。此其一。其二，愛育黎拔力八達在政爭前後的角色有被放大之嫌，答己的身影——一如過往中國史書中的女性——不免模糊難明。事實上，答己在政變期間，不只是眾人需要請命而行的橡皮圖章，更且實際爭取到重要官員的效忠。政變成功後，她根據蒙古傳統，作為籌備召開選汗大會的負責人，更是大權在握，甚至展露謀立少子為帝的政治野心。其三，岡田英弘另闢蹊徑，強調答己母子政變的成功，原因在於答己的弘吉剌氏出身。但是，他所提出「弘吉剌派」或「弘吉剌時代」的說法，一旦放回實際的元朝政治情勢裡，恐怕就很難令人信服。

復次是答己在武宗朝的政治表現。答己原本試圖勸退長子海山，支持末子即位，卻迫於海山兵威而未果，最終母子三人達成授受協議。武宗即位後，尊其母答己為皇太后，立其弟為皇太子，逐漸形成「三宮」——三個政治中心的新局。答己接收並擴大太后原有位下官署的徽政院，其司屬多見添設與陞改品秩，另又獲撥諸多湯沐邑和瑞州蒙山銀場，享有種種特權。三宮鼎立的態勢下，皇太后與皇太子顯然屬於同一陣營。武宗朝的皇太子權勢極大，既有位下官署的詹事院，又領中書令，幾乎是與皇帝共有天下。答己太后與其位下徽政院對於朝政的影響罕見記載，徽政院院使和官員可知者極為有限，任官期間的事跡更是難以索考，可能都與皇太子強勢主導國政不無關係。值得注意的是，方臣祐作為服侍答己太后的高麗宦者，且是徽政院掌謁司長官，由於親近太后而有進言改變高麗國勢的機會，已是徽政院官員左右政局的難得紀錄。此外，至大元年（1308）開始清理的大護國仁王寺寺產，有助於充實豐厚答己太后的財富基礎，而過往受到詬病的五臺山建寺與內旨干政，放在元代特有的政治史脈絡裡，恐怕就不必苛責。

最後，至大四年（1311）正月，武宗死，在位五年。兩個月後，愛育黎拔力

八達順利按照兄終弟及的協定，登上皇位，是為仁宗。仁宗希望打破叔侄相繼的約定，必須爭取太后的支持，加上孝順天性與強調儒家君臣名分，使得太后獲取更大的權力運作空間。答己太后的權勢，失去強勢皇太子的主導，以及弱勢皇帝的退讓下，因而在仁宗朝達到頂峰，更且構成一個有力的政治集團參與朝政，幫助太后與皇帝共治天下。這個政治集團對於仁宗、英宗二朝，以至於元朝中、後期的政治發展，影響深遠。¹²⁹ 

徵引書目

一、史料

- (宋)彭大雅撰，(宋)徐霆疏證，許全勝校注，《黑韃事略校注》，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4。
- (元)不著撰人，洪金富校定，《洪金富校定本元典章》，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
- (元)元明善撰，(清)繆荃孫輯，《清河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據清光緒、宣統間刊《藕香零拾》本影印，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據清光緒、宣統間刊《藕香零拾》本影印。
- (元)伯杭等纂，(元)張珪、(元)完顏納丹等續纂，方齡貴校注，《通制條格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
- (元)邵亨貞，《野處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元)姚燧著，查洪德編校，《姚燧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 (元)張伯淳，《養蒙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 (元)張伯淳，《養蒙先生文集》，收入《元代珍本文集彙刊》，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鈔本影印，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據國立中央圖書館藏鈔本影印。
- (元)張伯淳，《養蒙先生文集》，收入《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據元至正六年(1346)張氏家塾刻明宣德七年(1432)遞修本影印，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據元至正六年(1346)張氏家塾刻明宣德七年(1432)遞修本影印。

¹²⁹ 許正弘，〈元答己太后政治集團與仁英二朝政局〉，頁1-44。

- (元)張伯淳，《養蒙先生文集》，收入《原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善本叢書》，據清鈔本影印，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據清鈔本影印。
- (元)許有壬著，傅瑛、雷近芳校點，《許有壬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 (元)陳旅，《陳眾仲文集》，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叢書》，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至正刻明修本（卷8-13配清鈔本）影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至正刻明修本（卷8-13配清鈔本）影印。
- (元)揭傒斯著，李夢生標校，《揭傒斯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元)程鉅夫著，張文澍校點，《程鉅夫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 (元)黃潛著，王頌點校，《黃潛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 (元)虞集著，王頌點校，《虞集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 (元)劉敏中著，鄧瑞全、謝輝校點，《劉敏中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
- (元)劉敏中著，鄧瑞全、謝輝校點，《劉敏中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
- (元)蘇天爵著，陳高華、孟繁清點校，《滋溪文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明)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點校本。
- (明)李正儒創修，(清)賴于宣重輯，(清)汪度續修，《藁城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據明嘉靖十三年（1534）刊民國二十三年（1934）鉛字重印本影印。
- (明)葉子奇，《草木子》，北京：中華書局，1959，點校本。
- (明)鄭璠等修，(明)熊相等纂，《瑞州府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據明正德（1506-1521）刊本影印。
- (明)顧清等修，《松江府志》，收入《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0，據明正德（1506-1521）刊本影印。
- (清)毛嶽生，《元書后妃公主列傳》，收入《二十四史訂補》，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6，據《漸學廬叢書》本影印。
- (清)董濤，《曲陽金石錄》，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3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據清光緒三十年（1904）刊《重修曲陽縣志》卷11-13影印。
- (清)錢大昕，《元史氏族表》，收入《二十五史補編》，上海：開明書店，1937，據《潛研堂集》本排印。
- (波斯)刺失德丁特原著，波義耳英譯，周良霄譯注，《成吉思汗的繼承者》，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 （高麗）李齊賢，《益齋先生亂藁》，收入《麗季名賢集》，漢城：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1959，據朝鮮純祖十四年（1814）甲戌補刊本影印。
- （朝鮮）鄭麟趾等著，孫曉主編，《高麗史》，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標點校勘本。
-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19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2001；26冊起改由鳳凰出版社印行，2004。
- 屠寄，《蒙兀兒史記》，臺北：鼎文書局，影印本，1977初版，1994六版。
- 陳得芝、邱樹森、何兆吉輯點，《元代奏議集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二、專書

（一）中文

- 王德毅等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
- 王曉清，《元代社會婚姻形態》，武漢：武漢出版社，2005。
- 王頌，《內陸亞洲史地求索（續）》，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2。
- 王頌，《內陸亞洲史地求索》，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1。
- 杉山正明著，孫越譯，《蒙古帝國的興亡》，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 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增訂本。
-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北京：中華書局，2011。
- 李則芬，《元史新講》，第3、4冊，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
- 杜建錄，《中國藏西夏文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周良霄，《忽必烈》，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
- 岡田英弘著，陳心慧、羅盛吉譯，《從蒙古到大清——游牧帝國的崛起與承續》，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6。
- 阿不都熱西提·亞庫甫，《古代維吾爾語贊美詩和描寫性韻文的語文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洪金富主編，許正弘等助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元代石刻拓本目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7。
- 島田正郎，《北亞洲法制史》，臺北：中國文化學院，1964。
- 陳高華，《中國婦女通史·元代卷》，杭州：杭州出版社，2011。
- 陳得芝主編，《中國通史·中古時代·元時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陶晉生，《宋遼金元史新編》，新北：稻鄉出版社，2003。
- 傅光森，《元朝中葉中央權力結構與政治生態》，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

舒健、張建松，《韓國現存元史相關文獻資料的整理與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5。

劉迎勝，《察合台汗國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薛磊，《元代宮廷史》，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

（二）日文

杉山正明，《モンゴル帝國の興亡》，東京：講談社，1996 一刷，2003 六刷。

後藤富男，《內陸アジア遊牧民社会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8。

（三）西文

Lee, Hui-shu. *Empresses, Art and Agency in Song Dynasty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0.

Song, Lian. Translated by Louis Hambis. *Le Chapitre CVII du Yuan Che: Les Généalogies Impériales Mongoles dans l'Histoire Chinoise Officielle de la Dynastie Mongole. Avec des Notes Supplémentaires par Paul Pelliot*. Leiden: Brill, 1945.

三、期刊論文

（一）中文

中村淳著，寶力格譯，〈元大都敕建寺院概述〉，《蒙古學信息》，第 1 期（2003），頁 25-35。

方廣錫，〈元史考證兩篇〉，《文史》，第 29 輯（1988），頁 229-253。

王敬松，〈元朝廷辯〉，《民族研究》，第 3 期（2002），頁 84-93。

王耀庭，〈蒙元王朝帝后圖像〉，《故宮文物月刊》，第 226 期（2005），頁 58-71。

朱學武，〈涑水縣古塔綜述〉，《文物春秋》，第 4 期（1993），頁 63-68、80。

西熱桑布，〈藏文「元版」考〉，《中國藏學》，第 85 期（2009），頁 41-50。

周思成，〈元朝皇帝與星命、相術之關係新證〉，《北方文物》，第 4 期（2016），頁 96-101。

洪金富，〈元《析津志·原廟·行香》篇疏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9 本第 1 分（2008），頁 1-40。

胡和溫都爾，〈對〈元泰定帝壽年正誤〉一文的幾點商榷〉，《內蒙古社會科學》，第 5 期（1989），頁 75-78。

張帆，〈元朝詔敕制度研究〉，《國學研究》，第 10 卷（2002），頁 107-158。

張岱玉，〈元朝魏王家族史事鉤稽〉，《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3 卷第 5 期（2011），頁 5-9。

許正弘，〈元高麗僧義璇生平事跡考〉，《中華佛學研究》，第 11 期（2010），頁 45-75。

- 許正弘，〈元答己太后與漢文化〉，《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53 期（2011），頁 89-108。
- 許正弘，〈論元朝闊闊真太后的崇佛〉，《中華佛學研究》，第 16 期（2015），頁 73-103。
- 許正弘，〈杭州飛來峰元至元二十九年造像題記疏證〉，《中華佛學研究》，第 17 期（2016），頁 61-87。
- 許正弘，〈權守上位——卜答失里太后與晚元初期政治〉，《漢學研究》，第 38 卷第 2 期（2020），頁 171-214。
- 許正弘，〈元答己太后政治集團與仁英二朝政局〉，《臺大歷史學報》，第 66 期（2020），頁 1-44。
- 許正弘，〈元成宗繼位問題探析〉，《清華學報》，新 51 卷第 3 期（2021），頁 473-512。
- 許正弘，〈闊闊真太后與元成宗朝政治——兼論太后位下徽政院的建立〉，《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66 期（2021），頁 45-84。
- 郭德靜，〈論答己在元代政治鬥爭中所起的作用〉，《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5 卷增刊（2003），頁 202-204。
- 陳一鳴，〈論元代的太子參政問題〉，《內蒙古社會科學》，第 1 期（1992），頁 81-88。
- 黃永年，〈說永徽六年廢立皇后事真相〉，《陝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 期（1981），頁 81-89。
- 葉新民，〈元上都的官署〉，《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 期（1983），頁 79-92。
- 達力扎布，〈元朝宣徽院的機構和職司〉，《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 11 期（1987），頁 43-53。
- 趙文坦，〈元武宗改皇儲事件發微〉，《中國史研究》，第 2 期（2005），頁 101-111。
- 蕭功秦，〈論元代皇位繼承問題——對一種舊傳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銳變過程的考察〉，《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 7 期（1983），頁 22-39。
- （二）日文
- 小畑是也，〈元朝詹事院制度研究〉，《史學研究》，第 207 號（1995），頁 46-69。
- 中村淳，〈元代大都勅建寺院の寺産——大護國仁王寺を中心として〉，《駒澤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第 71 號（2013），頁 1-28。
- 宮紀子，〈『元典章』が語るフレグ・ウルスの重大事変〉，《東方學報》，第 91 冊（2016），頁 309-450。

(三) 韓文

李玠爽，〈元宮廷의 高麗출신 宦官과 麗元關係〉，《東洋史學研究》，第 113 期（2010），頁 143-170。

四、專書論文

(一) 中文

于磊，〈遼陽洪氏家族與高麗王室關係述論——以蒙麗關係史為視角〉，中國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 13 輯，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頁 303-309。

毛海明，〈《元史·成宗紀一》至元三十一年史事箋證〉，劉迎勝主編，《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 32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頁 1-30。

李心宇，〈元代徽政院研究〉，劉迎勝主編，《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 40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頁 75-90。

李逸友，〈內蒙古史跡叢考〉，魏堅主編，《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 2 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頁 393-411。

孟克巴雅爾，〈歷史上的九十九泉〉，齊木德道爾吉主編，《蒙古史研究》，第 10 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0，頁 34-53。

邱軼皓，〈見諸波斯史料的一場元代宮廷政變——以《瓦薩甫史》《完者都史》為中心的考察〉，收入北京大學伊朗文化研究所編，《伊朗學在中國》，第 5 輯，上海：中西書局，2021，頁 219-236。

阿不都熱西提·亞庫甫，〈敦煌北區石窟出土回鶻文文獻的綜合研究〉，彭金章主編，《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1，頁 429-477。

姚大力，〈元仁宗與中元政治〉，氏著，《蒙元制度與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 366-389。

洪金富，〈元代的收繼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世社會文化史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頁 279-314。

高仁，〈元代詹事院新考〉，姜錫東主編，《宋史研究論叢》，第 18 輯，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16，頁 420-436。

張帆，〈《元典章·新集》的一條文書看元朝中後期的御前奏聞決策機制——兼析《新元史》等書的相關謬誤〉，方鐵、鄒建達主編，《中國蒙元史學術研討會暨方齡貴教授九十華誕慶祝會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頁

262-273。

張岱玉，〈元代漠南弘吉剌部首領事跡考論之二〉，中國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12輯，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10，頁121-131。

張金鈺，〈元泰定帝生年及其他〉，中國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10輯，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5，頁71-74。

陳得芝，〈元嶺北行省建置考（下）〉，氏著，《蒙元史研究叢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頁170-200。

陳得芝，〈耶律楚材、劉秉忠、李孟合論——蒙元時代制度轉變關頭的三位政治家〉，氏著，《蒙元史研究叢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頁631-664。

陳得芝，〈《元史·李孟傳》訂補〉，劉迎勝主編，《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22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9-16。

陳韻如，〈蒙元皇室的書畫藝術風尚與收藏〉，石守謙、葛婉章主編，《大汗的世紀：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頁266-285。

劉曉，〈「南坡之變」芻議——從「武仁授受」談起〉，中國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12輯，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10，頁47-66。

劉曉，〈元代太廟制度三題〉，達力扎布主編，《中國邊疆民族研究》，第7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3，頁52-69。

蔡美彪，〈遼代后族與遼季后妃三案〉，氏著，《遼金元史考索》，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100-125。

蔡美彪，〈脫列哥那哈敦史事考辨〉，氏著，《遼金元史考索》，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286-316。

蕭啟慶，〈千山獨行：我的習史歷程〉，氏著，《內北國而外中國：蒙元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1-17。

韓志遠，〈元代婚姻制度述論〉，北京師範大學古籍所編，《元代文化研究》，第1輯，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268-288。

顧寅森，〈元大護國仁王寺名稱、地址考略〉，劉迎勝主編，《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第23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60-64。

（二）日文

植松正，〈元代江南の豪民朱清・張瑄について——その誅殺と財産官没をめぐって〉，氏著，《元代江南政治社會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7，頁297-335。

（三）韓文

高惠玲，〈方臣祐（1267-1343）小論〉，高柄翊先生回甲紀念史學論叢刊行委員會編，《歷史와 人間의 對應：高柄翊先生回甲紀念史學論叢》，漢城：한울

出版社，1984，頁 753-769。

(四) 西文

Zhao, George Q. and Richard W.L. Guisso. "Female Anxiety and Female Power: Political Interventions by Mongol Empresses during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in China," in Michael Gervers, Uradyn E. Bulag, and Gillian Long eds., *History and Society in Central and Inner Asia*, No. 7, Toronto: Asian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05, pp. 17-46.

五、學位論文

邱軼皓，〈蒙古帝國的權力結構（13-14 世紀）——漢文、波斯文史料之對讀與研究〉，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學位論文，2011。

馬曉林，〈元代國家祭祀研究〉，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12。

張岱玉，〈《元史·諸王表》補證及部分諸王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

陳怡如，〈《元史》〈后妃傳〉與〈后妃表〉證補〉，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1。

（責任編輯：楊茜文、董百坊）